

“党建+新乡贤”引领乡村振兴研究

——绍兴的经验及启示

夏婷 袁海平¹

(绍兴文理学院对外联络处,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绍兴以组织振兴为基础, 抓住乡贤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民生实事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内容, 逐步探索出了“党建引领、新乡贤助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 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2020年10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1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了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2021年2月25日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压茬”推进,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那么, 浙江如何在“压茬”推进乡村振兴领域建成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绍兴基层党组织引领、新乡贤助力, 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借鉴。

1 绍兴“党建+新乡贤”提出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办好农村的事情, 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在党。必须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21世纪初, 绍兴作为浙江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率先发展的典型代表, 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民富裕的目标。与此同时, 像浙江其他地区一样, 也存在农村产业单一、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够等问题。乡村振兴亟待破题。2003年, 浙江全面实施“千万工程”, 推动浙江的小康建设从吃饱穿暖向更高水平进军。2004年, 习近平同志批示肯定绍兴柯桥兰亭街道驻村指导员制度, 推动绍兴率先开启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征程。2008年, 绍兴晚报整版刊登了《新乡贤倾情弘扬乡贤文化, 青少年“知、颂、学”乡贤精神》的文章, 对上虞市乡贤研究会进行了报道, 绍兴成为“新乡贤”概念的诞生之地, 同时也是“乡贤研究会”首创之地。新乡贤具有更广泛的内涵, 既包括一直扎根农村的本土乡贤, 也包括虽然离开故土但愿意反哺家乡的离土乡贤。

绍兴始终坚持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积极探索新乡贤回归兴村治村新路径, 凝聚乡贤智慧、汇集乡贤资源、发挥乡贤力量, 搭平台、建机制、抓活动, 走出了“党建引领、新乡贤助力”的乡村振兴之路, 激发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¹**作者简介:** 夏婷(1978-), 女, 浙江富阳人,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高教管理、公共管理; 袁海平(1970-), 女, 浙江诸暨人, 教授, 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 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党建+乡贤”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来自绍兴的经验”课题研究成果(编号: 145011)

2 党建引领下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作法

2.1 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整合新乡贤强大合力

一是全面加强政治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的所有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绍兴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加强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每一个村社党支部，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增进情感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自觉把“个人梦”“绍兴梦”“中国梦”有机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全局，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二是全面加强组织引领。农村党基层支部是乡村振兴的战斗堡垒，而村书记则是“领头雁”。绍兴积极吸纳优秀乡贤担任依托农村领头雁工程建设，感召在外新乡贤回归，特别注重把思想政治素质好、带头致富能力强的在外乡贤回乡建设，推动农村各项事业有序发展。如皇甫庄村支书陈成松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2005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极力劝阻，毅然放弃了在上海打拼了半辈子的事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15年来，他带领全村村民，将一个贫困落后村改造成为一个人人羡慕远近闻名的富裕自足新农村，他个人也因此被评为省级劳模和被选为市人大代表。

2.2 以“四个重点”为抓手指引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全域提升

绍兴在紧抓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牛鼻子”的同时，牢牢抓住乡贤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乡村治理、民生实事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内容，达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

一是抓产业振兴。主要是发挥新乡贤经济优势，吸引资金、项目等回乡落户，助力产业升级。例如，柯桥区漓渚镇新乡贤徐洪尧、刘建明在漓渚镇和周边乡镇投资过亿万元；诸暨市江藻镇江藻村新乡贤钱治辉，回乡成立注册6000万元的玉丰玉文化产业园，建筑面积达到了68000平方米；越城区孙端街道近年来共有15名新乡贤回乡创业，累计开发楼盘面积23万平方米，其中由乡贤自发投资运营的越城区首个田园综合体“树童部落”，提供就业岗位80个。由嵊州籍新乡贤陶春风投资的长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从对接投资意向到正式签约，仅用了21天，投资总额高达50亿元，是嵊州近年规模最大的乡贤回归项目。

越城区连续两年举办“同心·越城”大会，累计投资总金额达458亿元；上虞区近3年引进乡贤回归项目69个，合计投资额超600亿元；嵊州连续举办4届越商大会，邀请全球各地1000多名乡贤代表回乡参会，成功签约项目77个，总投资达842.7亿元……无论是回乡投资，还是将相关项目延请回乡，广大乡贤主动参与家乡建设，助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成为农村产业兴旺的“生力军”。

二是抓乡贤文化。主要是发挥新乡贤在家乡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乡贤文化扎根乡村，是乡风文明的一个重要分支，良好的乡风具有浸润人心、引领向善的作用。乡贤宋卫平捐款1亿多港元，新建集越剧教育、研究、交流和展示于一体的艺术学校，成为“越剧艺术家的摇篮”；新乡贤俞发祥累计捐款500万元，对村内重要古建筑、老祠堂、古戏台等进行全面修复，有效保护了泉岗古村落历史遗迹。上虞区将乡贤文化元素融入学校硬件建设和德育课程建设，全区中小学共建立乡贤事迹陈列室或纪念馆10余个，并结合校园特色开辟乡贤长廊、乡贤主题大厅等乡贤文化空间150余处。为了让更多人汲取乡贤文化带来的力量，营造崇贤尚贤、敬贤礼贤的社会氛围，绍兴还实施乡贤培育“青蓝工程”，开展“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感人事迹”典型选树宣传活动，让乡贤文化深植于年轻一代的血脉之中，实现“青蓝”相继青胜蓝，并通过建设乡贤馆、乡贤榜、乡贤广场等，打造乡贤聚会议事、回乡接待、展示成果的阵地，让乡贤有更多的归属感、荣誉感。

三是抓民生实事。主要是通过激发新乡贤爱乡助乡情怀，鼓励他们为民生事业多做贡献。疫情期间，越城区乡贤联谊会、参事会乡贤和异地商会组织共捐款215万元，捐赠口罩14.9万只。新乡贤谢吉祥曾出资近20万元用于建设村内道路，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乡贤参与到东豆姜村各项村务工作，2020年东豆姜村经济收入达45万元，顺利摘除经济薄弱村之帽；上虞区

由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 200 余个，基金本金总额超 20 亿元，涉五水共治、文化礼堂、道路修筑、卫生管理等各个领域；嵊州探索“乡贤+慈善爱心捐赠”“乡贤+医疗教育提升”之路，设立了“爱心助医济困基金”“名医工作室”，定向用于户籍人员的助医、济困。诸暨乡贤杨洪康无偿捐资 1 亿元建造村文化活动中心，乡贤王苗夫捐资 5000 万元设立助学助困基金，专项奖励品学兼优的家乡子弟。新昌乡贤吴锦华捐赠 700 万元，主要用于小将镇乡村公路建设等乡村振兴公益事业。

四是抓乡村治理。乡贤是推进基层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引导新乡贤深入参与基层矛盾化解，是对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回应。绍兴自觉增强窗口担当，聚焦影响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主要问题及短板，以新理念新思维破解改革中出现的难题，将新乡贤智慧嵌入社会治理，打好乡贤工作特色品牌，精细化提升层次，打造乡贤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鼓励乡贤积极调处民间纠纷。组织经济文化能人、老党员、老干部等有声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为本村建设服务的人士，发挥其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协调解决各类农村邻里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在柯桥，有 1100 余名乡贤进入乡贤娘舅队伍，这些乡贤娘舅是从每个村（居）挑选的。柯桥的做法得到了肯定。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各级各类娘舅工作室 283 个，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实现区、镇（街）、村（社）三级乡贤（娘舅）工作室全覆盖。二是探索推进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通过组织“三师三员”，即教师、医师、律师、公务人员、警务人员、银行职员等与百姓民生密切关联的群体回归家乡，组建医调会、交调会等专业性调解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把矛盾消除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通过搭建“四方会议”“民情通工作法”“村民说事”“品牌工作室”等平台，积极参与村级事务民主协商、矛盾纠纷化解、信访积案协处、公共安全联防。

3 新乡贤回归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

3.1 延揽新乡贤参与基层党建的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各地积极延揽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普遍重视新乡贤在构建乡村治理内生性秩序、提升乡村公共品供给能力、缓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尚缺少立足于基层党建视野的深入探索。比如，如何延揽乡贤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更好地发挥乡贤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通过乡贤组织的党建引领，提高党组织的辐射带动能力等。

3.2 吸引新乡贤回归乡村的激励保障机制不足

一方面，当前新乡贤回归乡村，多是利用乡贤所蕴含的地缘、亲缘、人缘等“人情面子”，激励乡贤服务家乡的方法不多、手段欠新。另一方面，在村级层面普遍没有建立乡贤联谊会，乡贤参与乡村重大事务的经费难有保障，乡贤奉献家乡的激励、评价、监督机制不全。

3.3 支撑新乡贤长期扎根乡村的政策引导不力

目前，各地在吸引新乡贤回归乡村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短期化、功利化倾向。调查过程显示，有的村的乡贤参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成为了弥补村民自治组织功能不足的短期化工具，村委会只有在遇到邻里纠纷调解、经济纠纷、交通事故矛盾化解等问题时会想到乡贤，一些村委会则把乡贤参事会当作了提升村级决策合法性的工具。这种短期化、功利化、错位化的做法极易给乡贤造成困惑，增加乡贤心理负担，引起乡贤不适，也不利于村庄共同体和乡村公共精神重塑，长此以往势必违背新乡贤回归乡村的初衷。

4 创新“党建+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启示

4.1 畅通渠道，搭建新乡贤助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平台

新乡贤不同于传统的“乡绅”，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接受市场洗礼和社会认可的本土精英，有新资源、新思路、新观念，是当

前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建设非常难得的人力资源。面对当前乡村振兴中遭遇人才短缺格局，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短缺问题，新乡贤返乡正好能够弥补短板。一方面，延揽新乡贤不仅可以引进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致富带头人”，还可以培养一批“政治过硬、甘于奉献的基层干部”，改变农村基层党建乏力的困境。另一方面，引领新乡贤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同时，也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如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制度、新乡贤履职情况定期评估制度，既要支持以村民推荐、组织选拔等方式选拔新乡贤进入村两委，也要畅通不能胜任职责要求的乡贤清除退出机制。

4.2 多措并举，构建吸引新乡贤回归的激励机制

“最是乡音解乡愁”，要让新乡贤“回得来”“干得好”“留得住”，在乡村振兴中找到归属感，需要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相关激励机制。一是日常勤联络多关心，如定期召开乡贤座谈会、邀请常年驻外乡贤返乡探亲，及时帮助解决在外乡贤父母等亲属在家乡所遇到的困难等，形成尊重乡贤、重视乡贤、爱护乡贤、信任乡贤的文化氛围。二是出台资金配套扶持、精神荣誉鼓励激励机制，为新乡贤回归乡村创造条件，解决其后顾之忧。比如对返乡后贡献较大的新乡贤予以表彰，在居住、补贴、医疗、养老等方面有所奖励。三是着力营建能吸引新乡贤返乡的软硬环境，让其愿意服务和安心服务于乡村振兴，比如加大对农村医疗硬件设施投入、提高乡镇医疗水平等。

4.3 制度创新，引导更多新乡贤长期扎根乡村

通过制度创新引导乡贤在城乡之间有序双向流动。一方面探索建立长期驻外乡贤退休回乡休养制度。让已经在外地落地生根的乡贤重新返回家乡生活和养老，从而发挥他们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资金方面的优势，鼓励其投身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实践。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相关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打破不均衡现状，为乡贤返乡创业和生活提供“绿色通道”，发挥乡村祖屋或老宅在乡贤心中的情感纽带作用，确保他们随时能够返乡生活。

参考文献：

- [1]张紧跟. 延揽乡贤：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9(06).
- [2]刘开君. 以制度化推动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基于对上虞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实践的反思. 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 2020(01).
- [3]杨帅, 李敏, 刘淑兰. 培育新乡贤：乡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新选择.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03).
- [4]唐辉, 唐云. 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彰显和重构——以崇州市凡朴生活圈为例[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0(02).
- [5]丰宝宾. 制度整合、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基于S县的案例分析[J]. 社会政策研究, 2020(03).
- [6]裘斌. 治村型乡贤主导下“三治融合”的拓展和创新——基于枫桥镇枫源村的探索[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04).
- [7]杜学峰. 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J]. 上海农村经济, 2020(04).
- [8]龚丽兰, 郑永君.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6).
- [9]郎友兴, 张品, 肖可扬. 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的经验[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04).

[10]徐晓光.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J]. 党建研究, 2018(06).